

义乌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

张敏杰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改革开放后,义乌人传承光大拨浪鼓文化,创造了吸引全球的“世界超市”模式和商业文化奇迹,义乌的小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是义乌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文章在回顾经济文化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对义乌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播影响进行了梳理。最后,作者从文化传承、政府作用、商人推动、人文环境营造等方面,论述了义乌文化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文化;义乌;拨浪鼓文化;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2)04-0026-07

一、引言

在世界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以其持续的发展、非凡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成为与北美、西欧鼎立的世界经济三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同西欧经济变迁引发人们对欧洲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宗教观念及其变革方式的关注一样,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引起了人们对非经济因素与中国崛起的关系的思考。中国的迅猛崛起给人提供的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是,文化在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甚至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望尘莫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义乌经济引人瞩目的超常规增长背后潜蕴着的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刮目相看,也对义乌文化的传承与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影响产生探究的兴趣和日益强烈的关注。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论述与阐释。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本性”即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相信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原则主宰着一切,哲学观念的发展对于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是恩格斯在他晚年的研究思考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

收稿日期:2012-03-29

作者简介:张敏杰,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的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开创了从文化伦理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先河。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等书中阐述了十分有名的“韦伯命题”,分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关系,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从此精神文化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影响成为理解与研究经济增长的另一条脉络。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曾对“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才存在的非经济因素和有关文化现象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达到具有普遍意义和和谐性发展阶段的科学”“罗马法和属于这个流派的西方法的严密的法学图式和思维方式”“理性的和声音乐”“哥德式圆顶建筑的合理利用”“报纸与期刊”“合理的、系统的和专门化的学问研究”“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支柱的职业官僚”“与家长制国家相对的身份制国家”“由定期选出的议员组成的议会”“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法规由职业官僚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的公共政治组织意义上的国家”“利用交易机会获取预期利润,因而(形式上)是以和平的营利机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化”“家计与经营活动的分离”“合理的簿记”“西方文化特有和独具的合理主义”“生活方式的合理主义”“合理的生活态度”,等等^[2]。这些内容可以被归纳为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四个范畴,是西方社会赖以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和制度支柱。

二战后,亚洲“四小龙”后来居上的经济崛起,使许多人发现东亚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和形式非但没有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帮助东亚社会更有效地利用和改进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成为创造奇迹的重要促进因素。也恰恰因此,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奇迹”使西方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异质文化的严厉挑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世界的发展重心开始由大西洋文明向太平洋文明转移,从而充分地验证了文化因素对经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3]。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引擎”和“燃料”。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义乌,这个位于中国浙江省中部的城市,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成为了繁荣、文明的义乌市的代名词。义乌的小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是义乌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的过程。

二、义乌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化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文化是民族之根、城市之魂。历史文化的传承、先进文化的发展、多元文化的融合,构成了增强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4]。也就是说,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义乌文化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横跨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包含了义乌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声名鹊起、远播海外,学术界对义乌文化的关注更趋火热,成为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

(一) 义乌文化的地域性

义乌文化的形成与积淀,与地域文化圈是分不开的。义乌文化的地域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

第一,义乌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义乌地域文化包括“尚文好学”的学术传衍、“尚武勇为”的义乌兵精神、“尚利进取”的商业文化三大支柱。正是在此三大支柱的孕育下,义乌社会的发展才展现出颇具地域特征的个性文化。而其中的商业文化对义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义乌商业传统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在当地流行的一种叫“拨浪鼓”的艺术样式。数百年来,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用本地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去外地走家串户换鸡毛,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敲糖帮”。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人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率先开放从事小商品市场的民间贸易。同时,在20世纪初,义乌佛堂镇因其便利的水运交通便成为当时东阳、义乌、永康等地区的商贸中心,汇集了本地和包括徽商、浙商、衢商、苏商在内的许多商人。正是由于地域文化中的包容、多元化精神,使商业发展冲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刺激经济的发展。

第二,义乌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自秦置乌伤,2200多年来受中原文化滋润、哺育,尽管地狭人稠、先天不足,然耕读传家、教化育人蔚然成风,致使薪火传承,不绝如缕,尤其是唐代之后学风渐盛,素有“小邹鲁”之称。据嘉庆《义乌县志》载:“义乌为孝子过化之乡。表孝悌而兴于学,宜不在它郡邑后。”旧时义乌,优学褒奖,助学成风。正是在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养育了威震一方的骆宾王、宗泽、朱丹溪等历史名人,也培育了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著名志士学者。秉承着“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义乌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抢抓机遇、敢为人先,在经济学家认为“不具有发展小商品集贸市场的自然优势”的义乌大地上用拨浪鼓摇出了一个闻名中外的“中国国际小商品城”。

第三,义乌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环境,其居民的心理、性格、行为都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文化区域的环境中,共享同一种文化,自然要接受区域文化的教化,因此其居民的心理、性格、行为也必然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历史上外来人口的陆续迁入义乌及与本地人口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造就了义乌文化的兼容性、挑战性和开拓性等等精神品格。人们创造文化,又受文化的塑造。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观念不但诱导着义乌人的价值追求,推动社会的消费需要,而且调节着群体的经济行为,影响着整个经济运行机制。

悠久的历史、浓厚的底蕴,由此形成内涵丰富、个性突出的义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是浙中地区乃至江南地方文化多样性和共融性的一个标志。作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地方文化体系,义乌文化鲜明的地域性,包括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个性张扬的军事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与时俱进的商贸文化。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

(二) 义乌文化的积累性

丰富多彩的义乌文化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文化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本土文化积累;另一种是外来文化积累。

所谓本土文化积累是指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和积累。早在距今1万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义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当时的义乌先民已能磨制石器、使用石斧、石刀等工具伐木狩猎,制造生活用具,而且已经可以用石锄种植作物,从事原始的农业,使人口从此繁衍生息。义乌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据嘉庆《义乌县志》载:“县古有学,肇自元魏(471~534)”。自宋以来,县学、孔学、义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土生其间,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从唐末楼颖始中进士后,至清末朱怀新止,有进士155名。其中南宋咸淳十年的王龙泽居榜首,为科举时代金华八婺4名状元之一。这些贤达之士,在义乌历史上,不仅对本地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乃至对世界文化都曾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也代不乏人。他们都是在义乌重教兴学风气熏陶下,自成一家,为桑梓增光生色;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耀古烁今。

所谓外来文化积累是指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相互吸取的积累。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系统

的,因此,人们一旦发现其他地域的某种文化能适应本土,并为本土所需要,就会把这种文化接受过来,变成自己文化积累的组成部分。义乌虽然具有悠久深远的文化传统,但是在历史上又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继承了华夏文明光辉成就的同时,义乌也是历史上较早受到域外文化影响到地区之一。义乌地区曾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随着浙江的佛教进入兴盛期,南朝萧梁时期,佛教传入义乌,历唐至宋,寺庙林立,僧尼众多,傅大士就是受西域高僧嵩头陀的指引,成为大乘佛教教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5]95-96}。可见,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正是由于义乌文化的不断创造和积累,所以文化才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本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外来文化接纳更新,使义乌的文化资源凝重而深邃。也正是由于文化的长期积累,不但使义乌文化对海外的影响成为可能,而且使义乌的文脉得以延续,为新时期义乌文化的创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三) 义乌文化的包容性

义乌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义乌文化或者说义乌人所具有的包容性特质的形成,与义乌人手摇拨浪鼓走南闯北的行商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行走四方,辛劳奔波时,最能体会的是出门的不易与艰辛,但他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时,一种朴素的好客情感会自然而然。可以认为,义乌本土文化中所孕育的包容因子、开放的因子为义乌的对外开放和商贸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5]372}

1987年9月出版的《义乌县志》,曾如是总结外来人口迁入而对义乌文化产生的影响:“本县古代人口稀少,汉代以后外地人陆续迁入。……迁入本县形成宗族的,以北方迁入者居多,也因此带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义乌的开发和兴盛。”^[6]据有关统计,近年来义乌外来人口呈高速递增的趋势,2003年,义乌市经登记暂住1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有60万,截至2010年底,长住义乌的外来建设者已达143.3万。^[7]其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常驻义乌外籍商人有1万多人,义乌本地人口的比重尚不足四成,义乌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外来建设者超过本地人口的多民族和外国籍人员聚居的城市,由此带来的义乌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也十分突出。如今,来自国内外的客商生活在义乌许多居民住宅区与本地居民和谐相处,构成了义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缩影。义乌文化的包容性,也直接反映在义乌的商贸文化之中。

总之,义乌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了义乌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包容性既为义乌的本地居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融入义乌的外来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义乌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文化在另一地域或另一民族中的影响,实质上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现象。用“传播”一词研究文化现象最初见于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主要指文化的迁徙、采借、暗示以及分布等。泰勒之后,“传播”一词渐渐为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普遍使用。文化传播使人类克服了孤立、独处和疏远的状态,使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更加息息相关,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据武斌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一文的研究,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从西汉时代开始。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8]。这四次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也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中,浙江因得濒海的地理优势,文化影响远播海外,尤其对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影响最大。义乌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的范畴,也是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义乌文化的海外影响这一命题置于文化传播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追寻义乌文化

海外传播的踪迹。

在学术方面,“2000余年来,义乌县的县名虽然历经过数次变动,但以孝为根本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却一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5]92}。孝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可说是又深又广。

在佛教方面,义乌佛堂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以规模宏大,高僧辈出而名扬中外。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日本僧人慕名而来双林,元朝以后,来双林寺的日僧就更多。日本早稻田大学至今存有《东阳郡乌伤县双林寺傅大士碑文》。特别是元代以后,日本僧人到双林学习的逐渐增多。同时,在双林寺住过的中国高僧也有到日本传教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元代高僧明极楚俊,他曾住持双林。元文宗天历三年(公元1329年),他应日本佛界的邀请,与竺仙梵仙一同东渡日本,历住建长、南禅、建仁等大寺。他宣扬中国式的禅风,对日本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显著的感化作用,许多公卿、武士向他学禅,深得当世的尊重。明极楚俊擅长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许多诗文流传至今。

在医学方面,义乌赤岸朱丹溪是我国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后世有“杂病宗丹溪”之说,不仅对我国,也对邻国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率先在日本传播丹溪学说的是日本医家、“后世派医学之开祖”——田代三喜,他大力倡导金元四大家,特别是丹溪学说。以其为首的后世派医家一扫往昔由于盲从《和剂局方》所带来的弊端,摆脱局方医学的桎梏,使日本汉方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此,“元医李东垣、朱丹溪的学说,成为日本李朱医学派的开山祖。曲直濂道三承其学统加以鼓吹,李朱学方便风靡日本,支配日本医学界近二百年之久”^[9]。

至近代,教育家陈望道、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历史学家吴晗等一批名人志士,都以他们的文章、精忠报国的精神以及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在中华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些人还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囿于义乌的地域相对封闭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义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义乌名人和文化事件几乎没有,即使傅大士、朱丹溪等人的学说与影响也基本局限于东亚一隅。义乌这一地名为海外所知,义乌文化在海外影响的扩大,其实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和商贸文化发达的结果。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义乌就出现了“敲糖换鸡毛”的商业活动,游走南北四方的义乌货郎担有上千人之多。这一极其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商品活动传统既为贫穷的义乌人提供了生机和赚钱的门道,也培育了义乌人肯吃苦、善经商的民性,进而在货郎担式小商品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拨浪鼓文化”。改革开放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风吹燃了义乌人心中从商的“星星之火”,义乌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抢抓机遇、敢为人先,在经济学家认为“不具有发展小商品集贸市场的自然优势”的义乌大地上用拨浪鼓摇出了一个闻名中外的“中国国际小商品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道路,并逐步形成了全国关注的“义乌模式”。市场丰富的货源、良好的经商环境、完善的服务体系不仅吸引了日流量数以十万计的国内客商,也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客商。

从1995年第一届义博会开始,义乌商贸文化正式迈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海外影响也不断扩大。作为新生的文化载体,义博会仿佛是整个义乌经济生活的缩微胶片,在世人面前展示的不只是丰富的交易品,更是迷人的商业文化;当来自国内外的近10万商人云集至此时,强烈的文化催化作用征服了世界。多元文化在义乌的碰撞、交流、互动和共生,形成了中国大地上颇有特色的跨文化交流的风景线。文化活动的牵针引线,把从世界各地来到义乌的人们联结起来,使他们产生宾至如归的共鸣,又为义乌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辟了航道。

四、义乌文化的创新路径

义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一跃而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城市,与义乌努力实施的文化工程和“世界超市”城市形象品牌塑造有很大关系,也是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紧密结合的结果。义乌人民从

实际出发,勤业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逐步形成了全国关注的“义乌模式”。然而,商本位的巨大经济成就不是无源之水,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 义乌人的文化品格

义乌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创造了令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源于义乌人的文化品格。义乌人善进取,擅开拓,敢冒险,富有商业头脑。对千百年来占主流地位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务实的义乌人早就悄悄地作了修正。以明代浙江文人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对义乌人的“务实重商”“通商惠工”“义利并存”的商业文化十分推崇,因此义乌人富含文化基因。在义乌人看来,文化的实力不在于获得关于知识的一纸证明。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一种素质,一种品格,是活泼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文化已经渗入他们生命的深处,成为他们近乎天生的行为模式。“拨浪鼓文化”的内涵,可以大体归纳为: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敢闯敢冒,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心态开放,走出引进,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百折不挠,善于变通,刻苦务实的实干精神;讲究实利,注重经商,重商尚利的市场观念等五个方面的内涵。这些也是“浙江精神”的一种演化。义乌商人走天下,无不渗透着拨浪鼓的文化精神,显示着拨浪鼓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继承与发扬。他们遵守国际市场交易规则,保证诚实信用关系,倡导诚实信用的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与外商建立了可靠的信赖关系,在海外确立了良好的义乌形象。总之,义乌的发展及其海外影响的扩大立足于义乌人民普遍的文化认同之上,从而构成其增强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创造着一个个商业文化的奇迹,推动着义乌走向世界。

(二) 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

义乌政府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之手”持续发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微观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又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作用,致力创新独特的发展路径,使市场发展纳入科学的轨道。具体说来,它担当好了四种角色:一是决策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当全国其他地区还在“沉睡”时,顺应民意开放市场,打开了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阀门”,提出“兴商建市”的发展方向,创造了义乌的先发优势。二是管理者,建设好服务商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业,少取多予,做好环境;在市场发展壮大过程中,该管的义乌政府绝不放手;三是协调者,通过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和市场的内在潜能,有效利用人财物等资源;四是监督者,时刻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秩序,做到奖惩分明。义乌市政府和有关政府部门为了扩大义乌的国际影响,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对外宣传推介。义乌形象广告片以“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为主题,选择以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频道CCTV—4播出,为城市品牌的进一步建立和义乌海外形象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 “义乌军团”大显身手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素有外出闯荡禀性和传统的义乌商人大举挺进海外,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义乌军团”,他们在国际经贸舞台上大展风采,在把义乌商品卖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地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信息带回义乌,促进义乌市场的小商品不断更新换代、丰富发展。其中那些被称为“义乌侨商”的海外华侨华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每年平均有10万人次和义乌有各种经贸往来,经营区域遍布世界各地,年采购贸易额约占义乌市场出口额6成以上^[10]。他们是提升义乌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的中坚力量,众多的“义乌侨商”还带领所在国的外国朋友乃至当地政要来义乌参观考察、发展经贸活动,成为义乌市的“民间大使”。

(四) 营造国际化的人文环境

为了促进义乌中外居民的交往与文化交流,义乌许多社区积极开展境外人员融入社区工作,营造境外客商“进得来、住得下、住得好”的和谐人居环境。自2002年起,义乌市人大在全国首先推出了外商

旁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义乌市各职能部门也想方设法开发整合各种外事资源,努力为广大外商在生活、工作、学习以及管理服务等各方面提供便利,使外国居民能够安居乐业。据一项“义乌外商生存状况调查”的数据,有49.86%被调查外商对义乌市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管理及服务表示满意,有43.60%表示基本满意,两者加起来占到了被调查外商的93.46%。在对义乌市民人文素养评价方面,有43.47%的被调查外商认为义乌市民的总体素质很好,有44.32%认为义乌市民的总体素质还可以,两者加起来占到了被调查外商的87.79%,说明绝大部分外商对义乌市民的总体素质是认可的^[11]。国际化的文化氛围,留住了不同肤色的商人在义乌长期居住,也使他们融入了义乌市民生活圈,更使义乌与国际沟通的桥梁更通畅。现在,义乌这个在浙中快速崛起的古城,已在不知不觉中和世界连成一体,越来越多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传统的外国人选择在义乌生活与经商,他们在享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成为义乌走向世界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恩格斯致瓦·博尔结乌斯[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 [2] 富永健一,李国庆. 马克思·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J]. 社会学研究,1988(2).
- [3] 张敏杰. 论非经济因素与东亚的崛起[J]. 浙江社会科学,1997(5).
- [4]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45-46.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 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6]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义乌县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7-98.
- [7] 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人民政府. 义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2011年1月)[EB/OL]. (2009-04-01)[2011-02-28]. http://xcb.yiwu.gov.cn/wsbs/fwxx/200908/t20090803_228283.html.
- [8] 武斌.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N]. 光明日报,2008-08-21(10).
- [9] 宋云影.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5.
- [10] 王晓峰,杨金坤,陈楠烈. 义乌侨商与中国小商品城——关于“义乌侨商”的调查报告[J]. 浙江社会科学,2011(1).
- [11] 陈旭华,朱华兵. 义乌外商生存状况调查[J]. 中外企业家,2007(7).

On Inheritance, Disseminates and Innovation of Yiwu's Culture

ZHANG Min-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f China, people in Yiwu hav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rattle-drum” culture, creating the pattern of “World Supermarket” and the commercial cultural miracle. With Yiwu's small commodities selling to worldwide, its culture has also disseminated to outside worl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sic theory related to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iwu's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innovation way of Yiwu's culture from the prospect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government functioning, merchant roll, and humanities environment building.

Key words: culture; Yiwu; rattle-drum cul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 彭何芬)